

# 报酬递增视角下美国与其盟国竞争的根源探析\*

张倩雨 田野

**[内容提要]** 美国是当今世界盟国数量最多的国家,但其与盟国间的竞争时有发生,并在特朗普第一任期愈加显化和激烈。美国与其盟国之所以展开竞争,主要源于它们对初始优势将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转化为长期优势的理性预期。由于报酬递增广泛存在于地理区位差异、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中,为竞取初始优势,美国与其盟国在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领域开展了广泛竞争。美加出于西北航道的协调效应而在地缘领域相互竞争,美欧出于航空制造技术的协调效应和学习效应而在技术领域展开竞争,美日出于货币金融治理规则的协调效应、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而在国际制度领域进行竞争。这些案例涵盖了美国与其北美、欧洲和东亚盟国自冷战时期直至当下在多个领域的竞争,展示了报酬递增的逻辑对解释不同时空条件下盟国间竞争的适用性。

**[关键词]** 报酬递增 美国同盟体系 地缘竞争 技术竞争 国际制度竞争

DOI:10.16502/j.cnki.11-3404/d.2025.01.015

美国是当今世界盟国数量最多的国家,其“在全球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由一个的确覆盖全球的同盟和联盟所组成的精细体系支撑的”<sup>①</sup>。然而,美国与其盟国间“内讧”时有发生。最引人关注的表现是,2017年,以“美国优先”为口号的唐纳德·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便着手调整联盟政策,以实现如下目标:在维持对既有联盟体系的绝对主导和继续享有战略收益的同时,削减自身成本投入和向盟国转嫁战略负担。有此经历的美国盟国均对特朗普第二任期的美国对外政策感到担忧。在此背景下,研究联盟体系内部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关系显得尤为必要且正当其时,并且可为分化和突破美国对华施压联盟提供学理性支撑。

## 一、盟国间竞争的根源:基于报酬递增机制的逻辑

联盟,即两国或多国围绕安全合作达成的正式或非正式承诺<sup>②</sup>,被认为是国家之间政治合作的高级形式。既有研究已深刻揭示,外部威胁的

\* 本文系2023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现代大国兴衰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启示研究”(项目编号:23&ZD038)的阶段性成果。

① [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6—37页。

②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in *Survival*, Vol. 39, No. 1, 1997, p. 157.

改变<sup>①</sup>、盟国之间实力对比的变化<sup>②</sup>、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sup>③</sup>以及替代选择的出现<sup>④</sup>等,均可能引发盟国间关系变动。遗憾的是,它们主要关注联盟国家由合作关系转向非合作关系的历时性变化,而未对盟国之间可能同时存在合作与竞争的混合关系予以足够重视。这可能受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既有研究从联盟的狭隘定义出发,将分析的焦点置于军事安全领域,而不关注诸如技术、国际制度等领域。正因如此,盟国间竞争这一可能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盟国间关系也就未能进入联盟政治研究者的研究视野。另一方面,既有研究多将竞争和冲突混为一谈,或将竞争视为冲突的一种前置状态,因此更关注可能转化为冲突的竞争,也就是对手之间的竞争。由此,盟国间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混合关系便如“房间中的大象”那般为人所见却鲜有深入的理论分析。

竞争,即各方争夺价值以及稀有的地位、权力和资源的斗争,最终目标在于胜过对方。本文认为,结盟国家对初始优势将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转化为长期优势的理性预期,促使盟国之间进入竞争状态。报酬递增是一种正反馈机制,表现为连续增加相同量的投入所引起的产出的增量越来越多。既有研究已经注意到了报酬递增在国际关系中发挥的作用。罗伯特·杰维斯指出,初始优势重要的观点已被战略贸易理论的倡导者吸纳,而在国际政治中,关注小优势的大影响的正反馈机制则体现在多米诺理论和螺旋模式中。<sup>⑤</sup> 罗伯特·吉尔平曾提出,要关注基于报酬递增的新增长理论、新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等新经济理论的政治含义。<sup>⑥</sup> 他认为,新经济理论将时空观引入经济分析中,有助于理解世界经济在全球财富和权力分配中不连续、不均衡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发生深刻变化的特征。但杰维斯和吉尔平均未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基于报酬递增假设的国际关系理论。事实上,报酬递增广泛存在于地理区位差异、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中。相应地,在国际政治中,报酬递增会表现为地缘报酬递增、技术报酬递增和制度报酬递增。

第一,地缘报酬递增。结构主义发展理论的代表人物冈纳·缪尔达尔认为,在二元经济的地理空间结构中,由于先起步区域的经济效益相对较高,资金会从落后区域流入先起步区域,由此带

来先起步区域收入的提高反过来又会引致资金的进一步流入。<sup>⑦</sup> 新经济地理学的主要创立者保罗·克鲁格曼发现,报酬递增在很多层面影响着经济活动的地理区位。在最低层面,一些特定产业的区位通常反映出因暂时性优势而形成的锁定现象,例如底特律的汽车产业、硅谷的芯片产业等。在中间层面,城市的存在就是一种报酬递增现象。在更高的层面,整个地区的不平衡发展可能是由报酬递增的累积性过程推动的。<sup>⑧</sup> 实际上,地理区位差异不仅影响经济发展,也会塑造政治结果。英国探险家沃尔特·雷利爵士曾有过一

- 
- ① Brett Ashley Leeds and Burcu Savun, “Terminating Alliances: Why Do States Abrogate Agreements?”, in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69, No. 4, 2007, pp. 1118 – 1132; Christopher B. Johnstone, “Japan’s China Policy: Implications for U. S. – Japan Relations”, in *Asian Survey*, Vol. 38, No. 11, 1998, pp. 1067 – 1085; 刘丰、董祚壮《联盟为何走向瓦解》,载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0期。
  - ② Patricia A. Weitsman, “Alliance Cohesion and Coalition Warfare: The Central Powers and Triple Entente”, in *Security Studies*, Vol. 12, No. 3, 2003, pp. 112 – 113; Alastair Smith, “Alliance Formation and War”,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9, No. 4, 1995, pp. 405 – 425; Brett Ashley Leeds, “Alliance Reliability in Times of War: Explaining State Decisions to Violate Treatie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57, No. 4, 2003, pp. 801 – 827; James D. Morrow, “Alliances and Asymmetry: An Alternative to the Capability Aggregation Model of Alliances”, i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5, No. 4, 1991, pp. 904 – 933.
  - ③ Richard K. Betts, *American Force: Dangers, Delusions, and Dilemmas in National Securit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68; Randall L. Schweller, “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1, 1994, pp. 72 – 107.
  - ④ Stephen M. Walt, “Why Alliances Endure or Collapse”, in *Survival*, Vol. 39, No. 1, 1997, p. 159; Glenn H. Snyder, “Alliance Theory: A Neorealist First Cut”, i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4, No. 1, 1990, p. 112; Thomas J. Christensen and Jack Snyder, “Chain Gangs and Passed Bucks: Predicting Alliance Patterns in Multipolarity”,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4, No. 2, 1990, p. 168.
  - ⑤ Robert Jervis, *System Effects: Complexity in Political and Social Lif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 157 – 161.
  - ⑥ Robert Gilp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103 – 147.
  - ⑦ Gunnar Myrdal, *Economic Theory and Under-developed Regions*, London: Duckworth, 1957.
  - ⑧ 参见[美]保罗·克鲁格曼《地理与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3页。

段经典论述: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贸易;谁控制了世界贸易,谁就控制了世界的财富,也就最终控制了整个世界。雷利的“三段论”直观地展现了海权时代国家掌握制海权所带来的报酬递增效应。著名的“麦氏三段论”则是陆权时代报酬递增机制的具体体现。哈尔福德·麦金德认为:谁统治了东欧谁便控制了“心脏地带”;谁统治了“心脏地带”谁便控制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便控制了世界。

第二,技术报酬递增。保罗·戴维在其对技术创新的研究中发现,QWERTY 键盘之所以在其与德沃夏克简化键盘的竞争胜出,并非因为它更高效,而仅仅因为它出现得更早。在技术上的相互关联性、规模经济和投资的不可逆性三种机制的共同作用下,明显低效的 QWERTY 键盘成为最终胜利者。<sup>①</sup> 在戴维的研究基础上,复杂经济学的创立者布莱恩·阿瑟对技术演变中报酬递增的形成机理做了更为细致的探究。阿瑟指出,某项技术一旦获得了初始优势,很容易将这种优势一直保持下去,形成技术锁定,并将其他技术淘汰出局。<sup>②</sup> 阿瑟由此将经济部门分为两大类,以自然资源为生产基础的行业(如农业、大宗产品的生产行业和矿业)属于报酬递减的领域,而以知识为生产基础的行业(如计算机、软件、制药、飞机、光导纤维和通讯器材)属于报酬递增的领域。为了适应以技术和知识为基础的报酬递增部门,国家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技术政策与贸易政策,因为国家的政策选择不仅将决定全球经济格局,而且将决定谁是成功者,谁是失败者。

第三,制度报酬递增。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道格拉斯·诺斯将阿瑟分析技术演进所得到的洞见推广到制度领域,指出制度变迁也存在着报酬递增现象。诺斯指出:“有两种力量形塑了制度变迁的路径:报酬递增,以及以明显的交易成本为特征的不完全市场。”<sup>③</sup> 在接受诺斯制度报酬递增逻辑的基础上,保罗·皮尔逊在《时间中的政治》一书中进一步提出,由于政治生活中的以下四个特点——集体行动的核心作用、制度的高度密集性、使用政治权威扩大权力不对称的可能性以及政治内在的复杂性和不透明性,政治制度的变迁比经济制度的变迁具有更多的报酬递增特性。<sup>④</sup> 约翰·伊肯伯里将这一逻辑运用于国际制

度的变迁上。<sup>⑤</sup> 从战后安排的角度看,一旦国际制度确立起来,霸权国就可以将其权力延续至未来。即使未来潜在的替代性国际制度比战后初期建立的国际制度更为有效,大规模制度变迁的成本也会导致制度替代很难实现。

综上,国际关系中的报酬递增机制体现在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领域中。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中的初始优势比其他领域的初始优势更可能转化为长期优势。因此,上述领域成为世界各国竞取初始优势的首选领域,盟国之间亦不例外。

报酬递增有四种发生机制,分别是:(1)大规模组织或固定成本;(2)协调效应;(3)学习效应;(4)适应性预期。<sup>⑥</sup> 由于经济系统与政治系统的差异,这四个发生机制在国家间竞争的各个领域并非普遍适用。第一个发生机制,即大规模组织或固定成本在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这几大竞争领域中都不显著,而另外三个发生机制——协调效应、学习效应和适应性预期,则在国家间竞争中均有体现。首先,协调效应,即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会使单个系统在演进过程中带动相关系统协同变化,在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领域的国家间竞争中均发挥作用。其次,学习效应,即有关系统演进的知识需要结合脱胎于旧系统的实践经验才能为行为体所掌握,在技术竞争和国际制度竞争中发挥作用。再次,适应性预期,即既定路径生成后,人们认为该路径将因大量被采用而得到持久延续和不断强化,并因此按照这种认知行动,促使

① Paul A. David, “Clio and the Economics of QWERTY”, in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75, No. 2, 1985, pp. 332–337.

② W. Brian Arthur, *Increasing Returns and Path Dependence in the Economy*,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University, 1994, pp. 13–29.

③ [美]道格拉斯·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0页。

④ Paul Pierson, *Politics in Time: History, Institutions, and Social Analysi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1–40.

⑤ John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Institutions, Strategic Restraint, and the Rebuilding of Order after Major War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⑥ W. Brian Arthur, “Self-reinforcing Mechanisms in Economics”, in Philip W. Anderson, Kenneth J. Arrow and David Pines (eds.), *The Economy as an Evolving Complex System*,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88, pp. 9–10.

这种认知最终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这一机制只作用于国际制度竞争。<sup>①</sup>

美国与其盟国的关系是二战后国际体系中最重要、最稳定的联盟关系，这些关系的变化与发展也经常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由于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领域的报酬递增效应突出，美国与其盟国在上述领域进行了多次竞争，如美国与加拿大的西北航道之争，美国与欧盟的航空竞赛，以及美国与日本围绕国际货币金融治理规则展开的竞争。这些竞争案例在历史跨度上纵贯冷战时期直至当下，竞争者既包括美国在北美洲和欧洲的盟国，也包括其在东亚的盟国，竞争内容涵盖了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多个领域。

### 二、地缘领域的盟国间竞争：美加西北航道之争

地缘竞争是国际竞争的传统方式。国家之间围绕关键性自然空间控制权的争夺已经引发过难以计数的战争和冲突。二战后，随着核武器所带来的战争形态的变化，传统地缘竞争的频率和烈度都有所降低。然而，围绕极地、深海、外层空间和网络空间等全球公域的竞争却在日渐升温。世界主要国家正在这些处于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外的公共空间积极布局，试图抢占战略制高点，谋求全球公域的规则制定权。这种竞争不仅发生在战略对手之间，也可见于军事盟国之间。

美国和加拿大的军事同盟关系始于二战期间的《奥格登斯堡协议》和《海德公园宣言》。战后，作为美加同盟关系延续和制度化的体现，北美防空联合司令部于1958年成立，在冷战时期和后冷战时代持续为北美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军事充分协作的基础上，美国还加强了与加拿大在国防经济领域的相互配合。然而，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却并未阻止美加两国围绕关键性自然空间展开竞争。同为环北极国家，围绕北极地区西北航道的归属问题，美加两国自1969年“曼哈顿”号航行事件以来产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冲突。有学者指出：“（至少在北极水域的）航行自由问题上，美加两国并非盟国，而是处于敌对关系。”<sup>②</sup>

控制西北航道所带来的协调效应是显著的。西北航道西起白令海峡，向东依次穿过美国阿拉斯加州北部的波弗特海和加拿大北极群岛水域，

最终汇入巴芬湾，是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捷径。与现有的苏伊士运河航道和巴拿马运河航道相比，这条行经北极的天然航道不仅可将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的航行距离缩短近一半，还可以通行上述两条运河航道无法通过的大船。近年来，受全球气候变暖影响，北极地区海冰融化加速，西北航道的通航能力和通航安全性不断提高，其经济和军事价值进一步提升。<sup>③</sup>

对加拿大而言，西北航道的协调效应同时体现在经济和军事领域。一方面，西北航道的商业性通航对促进加拿大北方地区经济繁荣意义重大<sup>④</sup>，并能显著提升其在全球贸易格局中的地位<sup>⑤</sup>。另一方面，如果承认美国在西北航道的“航行自由”权，那么“长期作为缓冲地带存在的北极水域很可能演变为大国争霸的战场”<sup>⑥</sup>，这将威胁到加拿大的国家安全。对美国而言，西北航道的协调效应则主要体现于军事领域，它是美国在大西洋和太平洋之间快速变换战略核武配置的重要捷径。如果没有“航行自由”，美国核潜艇的优势将很难得到发挥。美国第一份北极政策文件——1971年的《第144号国家安全决策备忘录》明确指出，北极地区海洋和领空自由属于国家安全，关涉美国武装部队在全球的机动能力。<sup>⑦</sup>美国后来的政策文件也多次重申这一立场。并且，如果加拿大对西北航道的主权要求得到认可，那么其他列岛诸国也会援引此例来限制美国在其他地区的

① 参见田野《大国竞争的根源：基于报酬递增机制的分析》，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9期。

② Edelgard Mahant and Graeme Mount, *Invisible and Inaudible in Washington: American Policies toward Canada*, Vancouver: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Press, 1999, p. 92.

③ Ho Joshua, “The Implications of Arctic Sea Ice Decline on Shipping”, in *Marine Policy*, Vol. 34, No. 3, 2010, pp. 713–715.

④ P. Whitney Lackenbauer, *Canada's Northern Strategies: From Trudeau to Trudeau, 1970–2020*, Calgary: University of Calgary, 2020, p. vii.

⑤ Department of Foreign Affair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The Northern Dimension of Canada's Foreign Policy”, <https://gac.canadiana.ca/view/ooe.b3651149E/11>.

⑥ Department of National Defense, “Challenge and Commitment: A Defense Policy for Canada”, [https://publications.gc.ca/collections/collection\\_2012/dn-nd/D2-73-1987-eng.pdf](https://publications.gc.ca/collections/collection_2012/dn-nd/D2-73-1987-eng.pdf).

⑦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ational Security Decision Memorandum 144”, [https://www.nixonlibrary.gov/sites/default/files/virtuallibrary/documents/nsdm/nsdm\\_144.pdf](https://www.nixonlibrary.gov/sites/default/files/virtuallibrary/documents/nsdm/nsdm_144.pdf).

通行,这对美国而言是不可接受的。

北极地区正在进入一个大国竞相争夺管辖权的时代。在第十一届北极理事会部长级会议上,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一反美加“冷处理”纷争的惯常做法,直斥加方对西北航道的主权要求为“非法”。作为回应,加拿大在随后发布的新版《北极与北方政策框架》中首次明确提出:“需打造有效的安保框架、国防体系和威慑能力以确保加拿大在北极地区持续享有安全”,特别是“要维持全年的、常规的军事力量部署以显示主权存在”<sup>①</sup>。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北极地区的地缘位置、资源蕴藏等所体现出的战略价值无疑将继续升高。面对这一潜力不断上升的战略要地,获取优势的关键在于抢占先机。作为环北极国家,美国和加拿大必不会放松对这一战略要地的控制。由此可见,各国对关键性自然空间的报酬递增特性的认知驱使它们与其他国家展开激烈竞争,即使竞争对象是关系紧密的军事盟国也在所不惜。

### 三、技术领域的盟国间竞争:美欧航空竞赛

技术竞争作为国际竞争的一种表现形式,其重要性在二战后日渐凸显。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围绕国防技术展开的较量,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和日本在半导体芯片技术领域的竞争,均反映了各主要大国对争夺全球技术领先地位的重视。这主要源于技术领域的报酬递增特性。在新的技术创新浪潮涌现的关键时期,技术范式转换带来了“弯道超车”的重要机遇,即使关系紧密的盟国也可能在技术领域展开激烈竞争。

二战以来,欧洲一直是美国关系最紧密的盟友,美欧联盟也一直是美国联盟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但近年来,美欧在联盟框架下的竞争与博弈日益激烈。作为现代科学技术以大型系统工程形式高度集成的产物,航空制造业集中反映了一国的国防实力和工业水平,被誉为“现代工业的皇冠”。在这一领域的激烈竞争可谓美欧竞争加剧的生动缩影。20世纪70年代,为打破国际民用航空市场长期被美国飞机制造商垄断的局面,法、德、英、西四国共同出资建立空中客车公司(以下简称“空客”),并为空客的技术研发提供了

大量低息贷款。为将竞争限制在可控范围内,美欧曾于1992年签署《美国—欧洲大型客机贸易协定》(以下称做“九二年协定”)。然而,进入21世纪,眼见空客A380项目顺利推进以及空客的全球市场占有率直逼波音,感受到威胁的美国于2004年单方面终止了这一协定,使得美欧航空领域的技术竞争进入白热化阶段。

从学习效应的角度看,航空制造业中机型及应用技术的更新换代往往依赖在“干中学”中逐渐积累的先前发展经验。例如,A310、A330和A340都是在空客研发的首款机型A300的基础上改进后推出的,波音747作为商业飞机中的标志性和旗舰性机型,也经历了多次迭代演变。航空制造业中存在一条明显的学习曲线,即飞机产量的增加将带来工人熟练度的提升和生产工序的优化,从而显著降低单位生产成本。<sup>②</sup>学习效应已使航空制造技术在20世纪90年代末进入一种路径依赖式的锁定状态。技术创新主要基于现有技术的增量变化,这使当前航空制造业的全球市场格局也凝固为波音和空客双头垄断的结构。<sup>③</sup>

欧盟明确认识到,航空制造业是基础广泛的技能、工艺和技术的集成,如果不能通过“干中学”保持创造性、创新性和适应性,快速的技术变革和日益激烈的竞争将使欧洲很快落后。<sup>④</sup>同样,美国也深刻认识到前期积累和经验对追求进一步创新和保持强大知识基础具有关键作用,这使政府干预的发展模式几乎从一开始就是美国航空制造业的标志性特征。<sup>⑤</sup>并且,为了帮助波音公司获得更多海外订单以支持后续机型的开发,美国进出口银行还为波音的外国买家提供了大量

① Government of Canada, “Canada’s Arctic and Northern Policy Framework: Safety, Security, and Defense Chapter”, <https://www.rcaanc-cirnac.gc.ca/eng/1562939617400/1562939658000>.

② T. P. Wright, “Factors Affecting the Cost of Airplanes”, in *Journal of the Aeronautical Sciences*, Vol. 3, No. 4, 1936, pp. 122–128.

③ Eldad Ben-Yosef, “The Evolution of the US Airline Industry: Technology, Entry, and Market Structure – Three Revolutions”, in *Journal of Air Law and Commerce*, Vol. 72, No. 2, 2007, pp. 305–312.

④ European Commission, “Strategic Aerospace Review for the 21st Century”, <https://ec.europa.eu/newsroom/growth/items/40778/>.

⑤ Vicki L. Golich, “Made in America? Sustaining a Competitive Presence in the Commercial Class Aircraft Industry in the 1990s”, in *The International Executive*, Vol. 38, No. 4, 1996, p. 465.

低息贷款或银行担保,这导致它一度被喻称为“波音银行”。<sup>①</sup>

从协调效应的角度看,航空制造业具有产业链长、辐射面广和联动效应强的特征,可以带动包括机械制造、电子、冶金、化工、材料、能源、信息和计算机等多个产业部门的协同发展。机型的更新换代也将对位于上游的航空发动机产业提出新的要求,进而提升国家高端工业领域的综合技术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说,航空制造业是高度战略性的产业,对国民经济整体发展具有极强的杠杆效应。同时,航空制造技术还具有军民两用的特征,大型民用客机在必要时可快速改装为军用特种飞机,扩充国家军备力量。

对美国而言,支撑其在航空制造领域保持领先地位的技术同样在其维持全球技术领导国地位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也正是美国将航空制造列为宏观发展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原因所在。<sup>②</sup> 美国政府为大型民用飞机产业提供了大规模和系统性的支持,以确保自身在信息通信、人造卫星、载人航天等其他领域也占据领先地位。<sup>③</sup> 美国对航空技术和产品市场的垄断则被欧洲视为“美国对整个空域的殖民”<sup>④</sup>。21世纪以来,民用航空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欧盟更加重视航空制造业的经济效益,将之视做财富创造者、创新驱动者和全球竞争力的维护者<sup>⑤</sup>,并认为航空制造业的发展将有助于欧盟实现“里斯本目标”,即成为世界最具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体,以更多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更大的社会凝聚力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sup>⑥</sup>

美国单方面撕毁“九二年协定”后,迅速以欧盟违约向空客提供大量非法补贴为由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诉讼,欧盟也随即起诉美国涉嫌为波音公司提供违规的税收倾斜政策。尽管2021年双方就持续17年的航空补贴争端达成五年关税“休战”协议,但考虑到航空制造业突出的报酬递增特性,美欧之间的航空技术竞争预计不会因为这份“休战”协议而停止。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在公开场合表态,如果欧盟给予空客的资金支持“越过红线”并导致美国制造商不能公平竞争,美国将保留重新加征关税的灵活性。美欧在航空技术领域的“马拉松式对决”,鲜明展现了“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 四、国际制度领域的盟国间竞争:美日货币金融治理规则之争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的深入推进前所未有地加深了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国际制度成为促进国家间合作和解决全球性问题的重要依仗。然而,制度的非中性特征使许多国际规则与国际机构成为制度主导国谋取私利的工具。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主导国所获初始相对收益随时间的推移不断放大,其他国家则不得不遵守这种利益分配不对称的国际制度。报酬递增在国际制度领域的存在,使世界主要国家围绕制度创建的初始优势展开激烈竞争。这种规则之争、机制之争、机构之争和秩序之争在盟国之间也时有发生。

二战结束后,美国和日本发展起了紧密的军事同盟关系,美国对日奉行全面的经济复兴政策。然而,这种亲密的双边关系却并不能让美国同意日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IMF”)之外建立一个专注解决亚洲货币金融问题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以下简称“AMF”)。美国给出的反对理由是,日本创建不受IMF监管的AMF将加剧亚洲地区的“道德风险”。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日本当时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持有国,具有了在国际货币金融领域发挥主导作用的

① John G. Francis and Alex F. Pevzner, “Airbus and Boeing: 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Strong States”, in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1, No. 4, 2006, p. 636.

②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 “The Competitive Status of the U. S. Civil Aviation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s of Technology in Determining International Industrial Competitive Advantage”, <https://nap.nationalacademies.org/catalog/641/the-competitive-status-of-the-us-civil-aviation-manufacturing-industry>.

③ Al Gore, “Final Report to President Clinton”, <https://fas.org/irp/threat/212fin~1.html>.

④ Mark A. Lorell, *Multinational Development of Large Aircraft: The European Experience*, Santa Monica: Rand Corporation, 1980, p. 48.

⑤ European Commission, “Competitiveness of the EU Aerospace Industry with Focus on Aeronautics Industry: Final Report”, <https://op.europa.eu/en/publication-detail/-/publication/3fdd63c8-6d5e-4ab5-9f0d-880a6404ea88#>.

⑥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Opinion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nd Social Committee on the ‘COM (2003) 600 Final’”, <https://eur-lex.europa.eu/LexUriServ/LexUriServ.do?uri=OJ:C:2003:220:0036:0038;EN:PDF>.

实力。一个日本主导且将美国排除在外的 AMF 可能削弱美国的地区影响力,并挑战美国在国际货币金融事务中的主导地位。

从协调效应的角度看,国际货币金融合作是一个涉及汇率政策协调、国际收支调整、货币互换安排、金融风险监管、危机救援机制等多领域的复杂制度网络。网络中的各种制度安排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和互补性特征,常常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构建一个排除美国且不受 IMF 监管的 AMF,将为日本向东亚其他地区辐射货币金融合作制度影响力提供机会和平台,进而增加其在国际金融制度改革中的话语权。

出于对协调效应的认知,时任日本经济研究中心会长小岛明曾向时任外务大臣河野洋平建议,应加快创建区域金融合作组织和培育区域资本市场,以推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的系统性改革。<sup>①</sup>然而,这种试图动摇 IMF 核心地位的尝试毫无意外地遭到了美国的强烈反对。受此影响,1999 年上任的日本大藏省副大臣黑田东彦只能改变前任的理想主义作风,变得更加实用主义。黑田东彦指出,一个成熟的、以 IMF 为核心的全球金融治理制度网络的存在,使得“AMF 只有在与 IMF 合作而非竞争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sup>②</sup>。

从学习效应的角度看,由于地理区位的临近性和教育背景的相似性,IMF 行政官员和美国官僚集团往往遵循的是同一套政策设计思路,这使得“美国知识”深嵌于 IMF 的决策中,成为美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实施其制度霸权的重要来源。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将 IMF 对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力应对部分归因于其与美国财政部的紧密联系,这使 IMF 在未做针对性研究的基础上就贸然推行了符合美国利益的援助措施,正是这些措施加剧了亚洲地区的危机状况。“美国知识”的嵌入使 IMF“难以发展一种可替换的知识框架,这意味着在下一危机中完全有可能出现相同的失误”<sup>③</sup>。

对于日本提出的亚洲国家自筹资金、自我救助的 AMF,美国认为,它将一定程度上改变亚洲地区金融政策的运作方式,进而引起各国内部技术官僚的知识更新和组织架构的相应变化,使亚洲国家逐渐形成与 AMF 相关的专用性资产以及对日本掌握结构性权力的 AMF 的制度黏性。这是美国所无法接受的。对此,时任日本大藏省副

大臣榊原英资毫不意外,“这是因为美国认为日本通过 AMF 对美国在亚洲的霸权构成了挑战”<sup>④</sup>。

从适应性预期的角度看,制度领导权的争夺背后往往还隐含着推广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考虑。当这种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经由制度接受国规范内化的过程转变为稳定的行为反应模式时,主导国将从中获得大量特权收益。<sup>⑤</sup>至少从里根政府时期起,美国对外经济政策就致力于让世界相信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真理”,进而推动各国社会经济改革,以这种“静悄悄的革命”的方式向外传播于已有利的规范和规则。<sup>⑥</sup>

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根源,IMF 坚持认为是东亚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问题,并给出了按照“华盛顿共识”进行改革的治疗方案。日本则认为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引发了危机,并反对 IMF 对东亚模式有效性的否认。榊原英资认为,AMF 的建立有助于维护和推广日本引以为傲的国家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打破“华盛顿共识”具有普遍适用性的虚假想象,并提升日本的制度吸引力,为其参与国际制度的“改制”和“建制”提供适应性预期的支持。美国对此的态度则是“我们需要日本的资金,但不需要日本的想法”<sup>⑦</sup>。

由于报酬递增机制的存在,AMF 一旦建立将会给日本带来超额的经济收益和权力资源。因此,美国对 AMF 表示强烈反对,并通过媒体渲染

① Akira Kojima, “Japan’s Contribution to Preventing a Reoccurrence of the Economic Crisi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Stimulating Their Economic Development”, [https://www.mofa.go.jp/policy/economy/study/m\\_report.html](https://www.mofa.go.jp/policy/economy/study/m_report.html).

② Jennifer Ann Amyx, “Moving Beyond Bilateralism? Japan and the Asian Monetary Fund”, in *Asian Pacific Economic Papers*, Vol. 331, No. 1, 2002, p. 17.

③ Joseph E.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2002, pp. 103 – 104, p. 129.

④ Phillip Lipsey, “Japan’s Asian Monetary Fund Proposals”, in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3, No. 1, 2003, p. 96.

⑤ Michael Mastanduno, “System Maker and Privilege Taker: U. S. Pow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World Politics*, Vol. 61, No. 1, 2009, pp. 121 – 122.

⑥ James M. Boughton, *Silent Revoluti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1979 – 1989*, Washington, D. C.: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2001, pp. 588 – 589.

⑦ Yong Wook Lee, “Japan and the Asian Monetary Fund: An Identity – Intention Approach”, 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50, No. 2, 2006, pp. 353 – 355.

日本的野心以瓦解东亚地区对 AMF 的支持。此外,美国还就提高 IMF 援助能力和改革援助条件作出承诺,削弱日本建立 AMF 的必要性。构建 AMF 的设想失败后,日本于 1998 年 10 月再次提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新方案——“新宫泽构想”,2000 年 5 月又提出区域性货币互换安排“清迈倡议”。但这些构想和倡议都回归双边层面,并将监督权交给 IMF,体现了美国在这场国际制度竞争中的胜利。此后,美国依然通过在 IMF 中的绝对优势地位保持着对国际金融秩序的控制。而在国际金融危机管理领域,IMF 也一直没有受到新的多边机构的挑战。

### 五、结语

合作、竞争与冲突是国家间常见的互动模式。然而,相较于国际合作与国际冲突,目前学界对国家间竞争的事实关注有余而理论探讨不足,对盟国间竞争这种国家间竞争的特殊类型更是鲜有一般性和机制化的讨论。本文则在以下两个方面推进了对盟国间竞争的研究。一是竞争的起因。研究显示,美国及其盟国对初始优势将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转化为长期优势的理性预期,促使双方在某些领域展开竞争。由于报酬递增广泛存在于地理区位差异、技术创新和制度变迁等领域中,美国与其盟国在地缘、技术和国际制度领域中都有可能展开竞争。二是竞争的发生时机。研究显示,当出现颠覆性变化导致领域内的既定路径被打破时,美国及其盟国将进入竞争状态,因为双方都希望率先获取新路径上的初始优势来谋求未来的长期优势。当前,网络空间正在成为继海、陆、空、天之后的“第五边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也正带来新的机遇,这些颠覆性变化可能再次引发美国与其盟国的竞争。

需要指出的是,联盟作为一种关于国家间安全合作的制度安排,并不能消除地缘特别是技术和国际制度领域的报酬递增机制,相应地也无法消除盟国间竞争的根源。不仅如此,联盟在抑制盟国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上也难以发挥作用。联盟只意味着盟国间的安全合作达到了较高水平,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其他领域中也会展开同一水平的合作。盟国要使对方做出让步甚至退出竞争,就要在合作领域与竞争领域之间建立起议题联系。

— 160 —

但在潜在竞争领域对盟国施加安全威胁以抑制竞争的做法可能损害安全合作中的承诺可信性,从而危及联盟体系本身。<sup>①</sup> 比起失去安全承诺可信性进而导致联盟体系的瓦解,盟国可能更容易接受合作与竞争并存的混合关系。由此,出于对某些领域中报酬递增的理性预期,盟国之间便可能在这些领域中转向竞争。

盟国间竞争这一事实显性化,拓宽了联盟困境的理论内涵,即联盟困境不仅会表现为“被抛弃”和“被牵连”之间存在内在张力,还可能表现为联盟国家在军事和安全领域保持紧密合作的同时却在其他领域展开激烈竞争,使得此前团结一致一致的联盟关系发生改变。对盟国间竞争的研究至少具有如下学理价值和现实意义。其一,国家间竞争是推动国际权力转移和国际秩序变迁的重要动力,这一论断已反复为历史上敌对国家间的竞争所证实,本文则揭示了盟国之间同样存在相互竞争的可能。盟国间关系的这种特殊变化亦将推动国际格局的转变,典型如 20 世纪 40 年代英美之间的霸权转移,以及当前美欧联盟因一些难以调和的矛盾而愈加明显的离心倾向。由此,本文找回了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的又一因素,为构建全面和具有一般性的国际竞争理论提供了重要补充。其二,本项研究揭示了,竞争关系不仅存在于敌对国家之间,在联盟国家之间同样存在。由此可见,国家间竞争并不必然演化为冲突,它可以被控制在不越过影响战略合作的底线之上。这弱化了既有国际关系理论将竞争与冲突混为一谈的倾向,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即当前处于竞争状态的国家,不论是对手还是盟国,都可从盟国间竞争的历史中学习如何管控风险,避免竞争向对抗和冲突转化。

[作者单位] 张倩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

田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年玥]

<sup>①</sup> 参见 Charles W. Kegley Jr. and Gregory A. Raymond, *When Trust Breaks down: Alliances and World Politic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0; 尹继武《社会认知与联盟信任形成》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